

论文旅融合的理论突破与实践进阶

——基于人文经济学的视角

张 铮 张慧敏

摘要:近年来,文旅融合在推动地方发展中产生的不可持续性问题日益凸显,学术界和产业界开始引介以地方创生为代表的外来理论来为中国地方振兴实践提供新的视角。事实上,文旅融合仍然存在丰富的理论空间和旺盛的实践活力,只不过包括地方性视角在内的丰富内涵被稀释于根深蒂固的产业逻辑偏向中,并导致了人文问题的外显。人文经济学的提出为文旅融合提供了理论突破和实践进阶的方向。人文经济学的内涵是强调经济发展向人文的回归,其对文旅融合的理论指向在于将“地方居民”置于突出地位,充分发挥“地方文化”的调节作用与赋能功能,这不同于传统文旅融合以“游客”为先、单一强调地方文化的旅游价值的发展思路。人文经济学指引的文旅融合实践的进阶路径包括三个方面,即确立“以人为本”的协作理念、打造目标一致的地方共同体,以及拓宽文旅融合的发展思路。

关键词: 文旅融合; 人文经济学; 地方发展; 地方居民; 地方文化

DOI: 10.19836/j.cnki.37-1100/c.2026.02.008

一、文旅融合介入地方发展的现实困境与理论应对

文旅融合是指通过文化资源的产业化和商品化,将静态的物质资本转化为可为人们所感受和体验的文化资本,实现“文化产业的旅游化”和“旅游产业的文化化”的过程^①。近年来,推动文旅融合发展已成为不少经济基础薄弱地方的选择。通过将生活方式、生活场景、生活习惯进行展演以及商品化^②,众多乡村、县域与城镇实现了由鲜为人知的地方向名声大噪的“网红景点”转变。对此,从国家到地方纷纷出台相关指导意见,为文旅融合介入地方发展提供政策指南。

然而,在近些年的实践中,文旅融合逐渐演化为“一种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的单向度转化过程”^③,致使其介入地方发展时不可持续问题不断涌现。这既表现为文旅经济发展形态不可持续,如网红景点的热度褪去后,地方再度回归寂静,以及主客关系存在的矛盾掣肘其稳步发展等;同时也反映为地方生态系统受外来文化的侵蚀而造成的“无地方性”发展危机,多数地方因文旅开发不当深陷过度商业化泥淖。此外,由旅游发展形成的大规模人口流动也影响着地方的环境系统及其生态要素^④。这些问题的出现,又反过来束缚文旅介入下的地方可持续发展。

事实上,文旅融合介入地方发展所呈现出的不可持续性问题并非一个新议题。自文旅融合命题正式提出以来甚至更早,便有学者对此进行研究。在文旅融合介入地方发展早期,相关研究多注重从文旅融合具体实践出发探求优化策略,认为文旅融合介入地方发展实践中的问题,主要源自实践

作者简介: 张铮,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文学博士(北京 100084; zhangzheng@tsinghua.edu.cn);张慧敏,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84; zhanghm24@mails.tsinghua.edu.cn)。

① 范周:《文旅融合的理论与实践》,《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9年第11期。

② 张铮:《人文经济学:超越精巧模型 洞察经济运行的深层动因》,《人文天下》2023年第10期。

③ 李倩、吴小根、汤澍:《古镇旅游开发及其商业化现象初探》,《旅游学刊》2006年第12期。

④ 贾衍菊、林德荣:《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驱动因素与影响机理——基于地方理论的视角》,《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年第7期。

主体及其行动。例如,韩荣鹏的研究指出文旅融合存在农民主体缺失、战略短视损害乡土传统价值、融合人才不足、政策制定落实不够等诸多问题,并提出做好顶层设计、探索融合模式、助力产业链集群建设等对策^①;罗大蒙等的研究则指出文旅融合助推乡村发展时所出现的融合流于形式、融于表面,同质化严重等问题,需要从文旅融合空间重构的角度发力,将乡村打造为乡村文化的展示空间、乡村生活的体验空间和乡村情感的生成空间^②。这些研究为深度推进文旅融合赋能地方发展的产业实践提供了重要方向。

近年来,有学者指出,这些策略仍存在“就文旅谈文旅”的局限^③。文旅融合的国家战略意义之于地方发展层面的体现,并非仅关乎地方文旅产业所带来的经济效益,而是蕴含着地方经济价值、文化价值、生态价值、民生价值在文旅中共生的根本逻辑^④。这要求文旅融合介入地方发展时跳出产业线性治理逻辑框架,关注整体意义上的“地方”。这一理论转向促使地方相关理论在中国的迅速发展,甚至有取代文旅融合在地方发展上的指导意义的倾向。地方创生作为影响力最盛的理论之一,已然成为当前促进地方发展的新理论准绳。

地方创生理论源于2014年日本政府为解决人口老龄化、少子化、人口过度集中都市圈所造成的乡村人口外流等问题^⑤而出台的一项中央政策,其主要理念围绕“地、产、人”,希望“根据地方特色、发展地方产业,推动青年人口回流”^⑥,从而建立一个拥有自主发展能力的可持续社会。“作为更加综合、更加系统的地方发展策略”^⑦,自2016年起,我国一些学者开始引入地方创生理念,试图以其指导乡村文旅与艺术建设。例如,向勇认为地方创生“统筹‘人、文、地、景、产’的地方元素,聚焦‘地、产、人’的关键要素,将给文旅融合带来更大的发展机遇和想象空间”,据此形构了地方创生视野下的文旅融合形态,即创意旅游^⑧。江凌也立足地方创生语境,提出了艺术介入乡村文化建设、艺术融合乡村文旅产业等的相关策略^⑨。

然而从实践来看,地方创生的理论效力远不如多数学者期盼的那样乐观。陈星海等基于我国地方创生实践现状指出,“这些已有的地方创生模式更多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外部输血模式,是由政府或者外来社会企业机构主导的地方创生,它们通常表现为短期且基于表面的解决方式”^⑩,揭示了地方创生在实践中浮于“空想”的性质。与此同时,地方创生理论的发源地——日本,在实践10年后,也凸显了“计划成效欠佳”,日本人口再次向东京“单极集中”^⑪。据此,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地方发展的理论工具,从文旅融合到地方创生,下一阶段的理论工具应是什么?这正是本文所聚焦的核心议题。

二、人文经济学视角下文旅融合的理论突破

理论界越过扎根中国本土的文旅融合,转而推崇日本现代化语境下的地方创生,实际上是理论不自信的一种表现。这一论断并非为了批驳理论借鉴行为,而是旨在指出,文旅融合本身具有的强大

① 韩荣鹏:《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下城乡文旅融合发展》,《社会科学家》2021年第12期。

② 罗大蒙、吴理财:《文化为魂:乡村文旅融合中的空间重构》,《南京社会科学》2023年第3期。

③ 孙九霞:《文旅发展驱动城乡融合的理论效能》,《旅游学刊》2024年第6期。

④ 傅才武:《论旅游开发在乡村文化振兴中的重要作用》,《旅游学刊》2024年第3期。

⑤ 宋海朋、张蔚文:《地方创生:日本应对人口减少的经验与启示》,《宏观经济管理》2021年第7期。

⑥ 李雯琪、张立:《台湾乡村建设与规划:建构新乡村共同体》,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60—61页。

⑦ 向勇:《创意旅游:地方创生视野下的文旅融合》,《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9年第11期。

⑧ 向勇:《创意旅游:地方创生视野下的文旅融合》,《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9年第11期。

⑨ 江凌:《艺术介入乡村建设、促进地方创生的理论进路与实践省思》,《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1年第5期。

⑩ 陈星海、葛舒悦:《以阿里乡村特派员为引擎的地方创生模式研究——以江西寻乌县为例》,《装饰》2024年第4期。

⑪ 朱玥颖:《日本人口再次向东京“单极集中”》,《人民日报》2025年3月31日,第12版。

解释力在这一过程中未能得到充分重视——地方创生越过文旅融合成为学界理论探讨的新“焦点”，文旅融合的本真内涵也未得到充分阐发。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强调，“文旅融合前景广阔”^①，高屋建瓴地指出了文旅融合蕴含的理论与实践生命力。而地方创生的所谓“地方优势”，早已是文旅融合的重要指向。早在相关政策文件中，文化与旅游的结合便被置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加以倡导，要求各地以“树形象、提品质、增效益”为目标，积极推动二者融合，以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时至今日，文旅产业的定位也不断超越单纯的经济支柱范畴。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在阐释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时明确指出，应“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业，把文化产业、旅游业培育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②。将文旅产业同时视为民生产业与幸福产业，充分体现了文旅融合在统筹地方经济、文化、社会与民生发展方面的多维价值与整体意义。而文旅融合之所以在介入地方发展过程中出现经济的单向度问题，关键原因在于文旅融合实践与理论的偏差。但这并非完全由实践主体操作不当所致，文旅融合理论自身所存在的产业逻辑偏向是更为本质性的原因。因此，有必要引入对经济发展具有极强指导意义的人文经济学，修正其根深蒂固的产业逻辑偏向，从理论创新的层面探讨实践与理论偏差的缝合之策。

(一)传统文旅融合理论的产业逻辑

文旅融合并非自上而下生成的指导性理论，而是实践倒逼的结果，其背后的产业逻辑正是在实践中一步步形成、强化并根深蒂固的。

纵观文旅融合的演进历史，其产业逻辑的形成最早可溯及20世纪80年代前后文化资源被开发成为新型的文旅目的地。当时，伴随着大众对文化、艺术等精神消费需求的高涨，地方文化取代过去的名山大川成为新的可供展演的旅游吸引物，包括古都、古城、古镇、文物、遗址等高级别的历史文化资源，在旅行社组织下，成为诸如故宫、长城、泰山、兵马俑、莫高窟等世界级文化旅游产品及线路^③。在这一背景下，原国家旅游局发布《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业发展的意见》，明确指出“在巩固观光产品基础性地位的同时，切实提升旅游产品的文化内涵和科技含量”，“促进旅游娱乐休闲的富文化性发展”^④。由此不难发现，在早期文旅融合实践中，旅游业被视为文旅融合的落点，文化为促进旅游发展而被融合进来。而旅游业的经济产业性质，便使文旅融合在初生时天然携带“产业逻辑”的基因。

而后，伴随着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在文旅融合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而不仅仅是一个“用来促进”或“锦上添花”的存在，文旅融合开始以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协同发展与实践表征。然而，产业层面的融合带来的是文旅融合产业逻辑进一步强化的结果。一方面，文旅融合作为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的结果，遵循产业经济的发展规律是文旅融合的必然结果。“产业的实质是一套特定的资产系统”，包括特定的生产技术、工艺流程、专利知识以及相应的原材料、设备、中间产品、劳动力以及高级管理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等^⑤。当产业之间的资产系统要素出现边界模糊甚至消失时，产业融合随即发生。文旅融合即是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之间的资产系统要素融合，反映的是要素分配、经营运作的产业思路。

另一方面，就目前文旅融合的实践模式与取向来看，其也反映了鲜明的产业运作逻辑。从整体

① 《习近平：坚定信心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 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https://www.qstheory.cn/20250520/ce6a962930334b10b551e6bf4dd2c018/c.html>，访问日期：2026年1月13日。

② 《推进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访文化和旅游部党组书记、部长孙业礼》，https://www.gov.cn/zhengce/202512/content_7050624.htm，访问日期：2026年1月13日。

③ 张飞：《文旅融合：历程、趋势及河南路径》，《中国旅游报》2020年6月5日，第3版。

④ 《国家旅游局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业发展的意见》，https://www.mofcom.gov.cn/zcfb/zgdwjmywg/art/2007/art_f37ff615ae554b68a4919330a5dfa58d.html，访问日期：2026年1月5日。

⑤ 胡永佳：《产业融合的经济学分析》，中共中央党校政治经济学系博士论文，2007年。

角度而言,文旅融合既表现为发生在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之间的双向融合,同时,文旅产业作为一种产业类型,又与其他产业发生融合,包括但不限于“文旅+商”“文旅+农”“文旅+体”等,以此来放大文旅融合的经济效果。从微观角度来看,文旅融合一以贯之地以旅游业为发力点,使文旅融合以文化展演化、商品化为旨归,并越发表现为一种“面向游客的文化可参观性生产”^①。在商品化逻辑下,游客成为文旅产品的最终检验者。文旅产品能否根据游客的需要被恰当地展示出来,既决定了“诗意”能否走向“远方”,亦决定了“诗意”能走多远。这便导致了当前地方文旅融合实践“过于注重向旅游倾斜”^②。

历史的、实践的种种因素无不指向一点:文旅融合融的是产业,指导的是产业。也正是这一套根深蒂固的产业逻辑存在,文旅融合的视角被无端限制于经济层面。而地方是一个由社会系统、经济系统、自然系统复合而成的有机生态系统^③,文旅融合在介入地方时难以充分激发地方活力,甚至反复陷入“经济理性”的桎梏中,便也不足为奇了。

(二)产业逻辑引发的人文问题

对文旅融合而言,产业逻辑本是使其生效的重要方式。然而,当文旅融合仅表现为产业逻辑时,将导致新的地方发展问题出现,即经济发展与地方人文的冲突。这在目前文旅融合实践中也逐步外显。

首先,外来力量成为新的地方主体,地方居民主动/被动失声。一般而言,地方因“整体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缺乏文旅融合发展所需要的资金、知识、技术等要素,所以必须向外引进资本,借助外来力量来实现地方发展”^④。这时“自上而下”的地方文旅开发模式成为一种必然,地方主导权也被迫交付给外来力量。外来力量在自组织过程中不断拓宽纵向与横向的社会网络,其在地方的权力和地位也由此得到加强与巩固^⑤。与此同时,现代化冲击加速了地方社会关系的个体化与原子化^⑥,地方乡土性与地方认同逐渐衰弱,地方主体参与地方事务的意愿下降;加之外部环境没有很好地调动地方居民的参与积极性,最终导致外来力量与地方主体在发展要素与权力上的差距越来越大。地方居民作为权力、资本、信息等资源相对弱势的一方,话语权被动旁落。在外来力量“喧宾夺主”,地方居民的主动性、能动性持续缺乏双重机制的共同作用下,文旅融合介入的地方日益成为外来力量的主场。

其次,在缺乏调和的基础上,外来力量与地方居民迥然不同的利益主张,使地方成为面向游客而非地方居民生产的空间。受商业投资逻辑的影响,外来力量的利益导向使其更关心文旅融合所能产生的经济效益,而非文旅融合对地方发展的重要意义,致使文旅融合成为“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地方经济开发项目,满足游客而非地方居民的需求成为第一性的重要存在。近年来大热的“艺术乡建”项目即便摒弃了过去的商业投资逻辑,但艺术家多“以自身的艺术标准、艺术审美、艺术眼光审视乡村文化”,“以自身的艺术理想和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俯视乡村文化”^⑦,也使地方成为一处供艺术填充的物理空壳而非具有在地意义的社会空间。对地方居民真实需求的忽视,既难以使文旅融合真正惠及地方,也容易造成主客矛盾,从而制约文旅融合的可持续发展。

最后,外来力量作为“他者”文化介入地方,也催生了外来文化与在地文化之间的冲突。文化景观是文旅业的核心旅游吸引物。在外来力量的主导下,“为迎合观看者的爱好,重新建构了某种视觉秩

① 张朝枝、朱敏敏:《文化和旅游融合:多层次关系内涵、挑战与践行路径》,《旅游学刊》2020年第3期。

② 张祝平:《以文旅融合理念推动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形成逻辑与路径选择》,《南京社会科学》2021年第7期。

③ 马世骏、王如松:《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生态学报》1984年第1期。

④ 陈诗妍、何志扬、吴琼:《包容、增能、赋权:民族地区文旅融合类发展项目的社会风险与缓解对策》,《河北旅游职业学院学报》2023年第4期。

⑤ 郑中玉:《都市运动与社区营造:社区生产的两种方案及其缺憾》,《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

⑥ 刘启英:《乡村振兴背景下原子化村庄公共事务的治理困境与应对策略》,《云南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

⑦ 江凌:《艺术介入乡村建设、促进地方创生的理论进路与实践省思》,《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1年第5期。

序”^①成为多数文旅融合的实践追求。地方搭建伪真实的舞台,来满足游客体验异文化的核心诉求。这些举措虽为地方带来了物质条件的改善,并与发达地方平等享有现代性带来的福利,但却在舞台搭建与地方空间重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削减地方色彩、较多地包装旅游功能等问题^②。这既背离了文旅融合最初的“促进文化”主张,同时也弱化了文旅融合的效力。此外,在当前时代背景下,游客的旅游诉求不再满足于“观光者”身份,而是渴望从旅游活动中体验“一种剥离等级差别和日常束缚的空间以满足平等交流的需求和群体的社会认同感”^③。在这样一种诉求转换下,游客对地方居民的日常生活等地方文化景观产生了兴趣,“见物又见人”的旅游体验在旅游市场中渐成风尚。而外来力量“跟风造景”的介入手段使文旅景观呈现出脱离地方文化与地方居民阐释视角的同质化倾向。这既悬置了文旅融合的“以旅彰文”目标,更无法满足游客体验“日常”的诉求。

其实,经济与人文之间的矛盾并非文旅融合领域的特有现象。回顾世界经济发展史,其中案例比比皆是。经济发展虽极大地增长了世界物质财富总量,但同时也引发了幸福感不足、生态环境破坏、资源消耗过度等对人类发展影响更为消极深远的问题^④。而从历史经验来看,呼唤人文关怀或回归人文精神的人文经济已然成为人文与经济这一矛盾的首要调和剂。

(三)人文经济学视角下的文旅融合理论

何为“人文经济学”?按照名词解构的思路理解,即人文的经济学。人文是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经济学则创建于西方人文主义衰落、理性主义兴起的时代背景之下。后在亚当·斯密、李嘉图等经济学家的理性发展下,经济学逐渐发展为纯粹的科学经济学——采用科学主义方法,对社会经济现象进行精密化分析与阐释,以透视经济发展规律^⑤。此举虽提升了经济发展的科学性,但也逐渐将人的本质欲求消解于一串串有关效率目标的数据符号之中,从而催生了一系列复杂性、动荡性问题。人文经济学的提出旨在重唤“人”的重要性来破除传统经济学“以物为中心”的发展思路,主张经济学向人文的回归,“坚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出发点来研究人类的经济学行为”^⑥。显然,人文经济学是一门内含“以人为中心的经济价值观与经济发展观”^⑦的学问,这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人在经济生产中的重要作用具有一脉相承的理论底色。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指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都是在经济发展上走在前列的城市。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⑧这一重要论述进一步丰富了人文经济学的理论色彩,揭示了人文经济学的第二重内涵,即文化与经济的互动关系,“文化是由经济决定的,经济力量为文化力量提供发挥效能的物质平台”^⑨。

综合目前人文经济学的理论成果,可以认为,要理解人文经济学的理论核心,至少应把握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经济活动向“人”的回归。这是人文经济学的立论之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出“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⑩,人文经济学则在此基础上将经济发展目的的人民性进一步显化出来,强调经济发展既需要充分挖掘经济发展的动力、潜力和价值,提升人的生活质量;

① 雪伦·朱津:《权力地景:从底特律到迪士尼世界》,王志弘、王明民、徐苔玲译,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第20页。

② 魏雷、钱俊希、朱竑:《谁的真实?——泸沽湖的旅游凝视与本土认同》,《旅游学刊》2015年第8期。

③ 蒋婷、苗莉、李春:《至味在人间:城市烟火气游客体验的探索性研究》,《旅游学刊》2024年第7期。

④ 胡钰:《人文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4年第4期。

⑤ 高德步:《中国经济学的人文转向》,《光明日报》2018年1月23日,第11版。

⑥ 郭志伟:《中国人文经济学:内涵、出场逻辑、研究主线与构建路径——基于中国式现代化视角》,《管理学报》2024年第6期。

⑦ 朱德位:《“人文经济学”说》,《人文杂志》1997年第1期。

⑧ 《深入研究人文经济发展的实践样本》,《人民日报》2023年10月20日,第13版。

⑨ 赵慧:《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红旗文稿》2025年第8期。

⑩ 韩喜平:《中国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路径》,《光明日报》2024年10月28日,第6版。

同时还需要努力开发人的潜力,使之转化为经济效益,并于其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①。二是经济活动向“文”的回归。人文经济学强调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这里的“文化”不仅仅将文化视为一种可产生经济价值、用于发展文化经济的资本,更强调文化对经济发展具有的显著“调节”作用。厉以宁曾提出,经济“效率增长是有潜力的。效率增长潜力的发挥,主要依靠效率的道德基础的存在,依靠道德力量的作用”^②,揭示了文化(道德)调节作为市场调节、政府调节等市场资源配置手段之外的第三重力量,在支撑经济体系良性运转上的重要作用。而文化之所以能对经济发挥调节作用,其关键原因在于“经济活动首先是人的活动,人的行为深受文化影响”^③。当经济主体的文化观念渗透在其主导的生产要素与经济行为之中,文化对经济的调节作用也将显化。

然而,也需指出,文化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并非总是正向的。这既受文化优劣的影响,如“有利于发展的文化和阻碍发展的文化”^④对经济发展的效应存在差异,同时也取决于文化的调节能力。马里亚诺·格龙多纳(Mariano Grondona)曾对文化价值观作出了相应的分类:一类是工具主义的,是“直接对我们有利,我们才予以遵循的价值观”;一类是内在的,是“我们不计个人得失而均予遵循的价值观”,它“也许是维护生存和安全,也许是拯济受难者,或者是追求卓越和威望”。他指出,持续发展所必备的价值观必然是内在的,而不能是工具主义的,“否则,一旦取得经济成就,价值观会随之消失”,只有内在价值观,才能“不停息地推进积累的过程”^⑤。足见不同文化价值观在文化调节能力上的区别。

那么,具体到文旅语境下,人文经济学何以指引文旅融合发展?从理论适用性而言,文旅融合表现为一种经济形态,人文经济学的人文优势与文旅融合的人文困境的“对症”,为文旅融合破除产业逻辑偏向提供了理论依据。这正如毛菲所言,在人文经济学指导下,文化和旅游将呈现出深度互融趋势:文化引领旅游焕发出更独特的魅力,旅游促进文化得到更深远的传承^⑥。

就作用机制而言,文旅经济活动的“人文”不足为人文经济学指引文旅融合提供了理论切口。一方面,在传统文旅融合的产业逻辑主导思路下,地方成为外来力量的经济试验场,地方居民逐渐隐身。对此,人文经济学指引下的文旅融合将强调以“地方居民”为核心开展文旅融合实践,并在行动主体中达成“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共识。胡钰的研究指出,人文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存在基本假设的差异,除了常常被论及的“经济人假设”外,“社会人假设”“文化人假设”在人文经济视野中也不容忽视^⑦。这意味着,相较于发展地方文旅产业、带来利益增收,依托地方要素,打造、经营地方品质将更能体现“以人为本”意识、契合居民诉求。诚如厉新建等指出的那样,地方品质不仅体现着地区竞争力,“也体现着地区宜居、宜业、宜游的能力和包容性”^⑧。可见,以地方品质而非地方旅游业为锚点的文旅融合,是对过去以游客为先的发展思路的超越,如何有效提高地方居民的生活品质、改善居民生活成为实践主体的核心关切。同时,由于地方品质与地方的每一位居民息息相关,因此,打造地方品质将有助于调动居民的“自为性”,这使得在实践中提高居民能力素养成为可能。

另一方面,传统文旅融合对“以文塑旅”中的“文”的理解,尚停留在文化资源、文化产业层面,使文旅融合的意义被束缚于文化促进旅游业发展的经济效益层面。人文经济学的引入有助于打破文旅融

① 朱德位:《“人文经济学”说》,《人文杂志》1997年第1期。

② 厉以宁:《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80页。

③ 韩喜平:《中国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路径》,《光明日报》2024年10月28日,第6版。

④ 劳伦斯·哈里森:《促进社会进步的文化变革》,载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编:《文化的重要作用 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358—359页。

⑤ 马里亚诺·格龙多纳:《经济发展的文化分类》,载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编:《文化的重要作用 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第88—89页。

⑥ 毛菲:《“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经济学话语表达》,《贵州日报》2025年5月14日,第7版。

⑦ 胡钰:《人文经济学的实践基础、基本假设与核心理念》,《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2期。

⑧ 厉新建、宋昌耀、陆文励:《全域旅游重塑地方品质》,《旅游学刊》2020年第2期。

合长期以来对“文”的资源偏见,强调“文”还具有引领产业、重塑产业格调品位的力量。这要求文旅融合实践主体重新审视“文”的内涵,同步强调文化对价值引领的调节作用,与文化作为一种资源的赋能功能。在调节作用上,要借由地方文化凝练而来的价值共识引领,规范文旅融合行动主体的经济行为,推进促进地方高质量发展这一核心目标的落实,并在此过程中依托专业力量提升、发展地方居民的能力,从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事实上,地方文化的调节作用是人文经济学指引下的文旅融合生效的前置条件,只有文旅融合行动主体在发展地方议题上达成“高质量发展”共识,文旅融合才可实现重视地方居民、地方文化的理论目标。在赋能功能上,则要依托地方文化由内“长出”文旅景观,而非由外导入文旅场景,以发展地方“人无我有”的独特文旅产品为目标,从而规避文旅产品的同质化以及与地方产业、环境强行“嫁接”的问题。实践表明,由地方文化资源转化而来的文化IP等资产化形式,因具有广泛的受众基础和多元的开发价值,有助于推动文化经济的业态升级^①,强化地方文化经济的市场感召力。这主要通过资产化赋能,即借“文化符号”“文化IP”搭建“文”与地方产业、景观等融合共生的桥梁来实现。因此,文旅融合还应重视在地方文化基础上发展内生的、可持续产生收益的“文化资产化”经济形态,以强化融合力与带动力。在“文化资产化”经济形态的作用下,文旅融合也将具备有机融合地方多类型经济的能力,当中不仅包括文旅产业经济,同时也包括“文旅+制造业”“文旅+渔业”等因地制宜的融合经济,由此促进地方经济韧性的进一步增强。

至此,传统文旅融合与人文经济学指引下的文旅融合的区别已然浮现,正是二者对“人文”作用的重视或不重视,塑造了其理论的独特方向。

三、人文经济学指引下文旅融合的实践进阶路径

从人文经济学指引下的文旅融合理论内涵出发,可以发现,优化我国文旅融合实践的关键思路在于突出“地方居民”的地位,同时依托“地方文化”的调节作用与赋能功能,合力发展地方内生的文旅经济。对此,将通过回答“如何突出地方居民地位”“如何发挥地方文化的调节作用”“如何实现地方文化的赋能功能”三个问题,来探讨人文经济学视野下文旅融合实践的可能进阶路径。

(一)确立“以人为本”的协作理念,强化地方居民的参与力与主导力

地方居民是地方事务的重要行动主体。人文经济学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强调,则进一步凸显了地方居民在文旅融合实践中的重要地位,即地方居民在享有文旅融合实践的参与权的同时,还应有条件借助文旅融合实践参与提升自身能力。但在现有文旅融合实践中,地方居民多处于边缘地位,参与权尚且不能保证,更遑论自我能力的提升。加之,“无论是企业家还是艺术家,他们认为村民不讲道理,思考问题的逻辑和自己不在一个频道上”^②,进一步加剧了外来力量对地方居民的漠视以及权力的剥夺。地方居民与外来主体在权力地位上的不对等关系,也最终导致了文旅融合实践的地方视角被解构。

结合当前文旅融合实践与理论期待之间的差距可知,增进地方居民的参与力与主导力是人文经济学视角下文旅融合的重要发力点,在未来文旅融合实践中,需要重视如下三方面的路径。一是发挥党组织、政府等在协商、权力赋予与保障上的重要作用,以政策引导、项目支持等方式强化外来主体“以人为本”意识,提高对地方居民参与的重视程度,以规章制度等方式明确保障地方的主导权以及地方居民的“发声”权,加快构建服务于地方居民与外来主体的议事协商机制与平台,使以人为本理念落于实处。二是重视外来力量对地方的立体多维赋能,依托外部精英的信息知识优势,以工作坊、文化特派员等“一对一”帮扶形式,促进居民在文旅融合各阶段的“自主性”与“能动性”提升。三是充分了

^① 向勇、白晓晴:《新常态下文化产业IP开发的受众定位和价值演进》,《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② 沙垚:《可沟通关系:化解乡村振兴多元主体关系的内在张力——基于A县的田野观察》,《新闻与传播研究》2023年第8期。

解地方居民需求,并将居民需求与文旅融合实践相结合,例如根据不同的技能需求确定不同的“一对一”帮扶内容等,以此激发居民的“自为性”,调动地方居民参与地方事务的积极性,实现“要我做”向“我要做”的思想转变。

(二)打造目标一致的地方共同体,发挥文化对个体行为的调节作用

除却参与权、主导力不足所导致的“不能”,地方居民主观态度上的“不愿”则是限制其参与文旅融合实践的另一重要原因。这需要充分发挥文化的调节作用。过去的观点认为,“只要能提供在地就业岗位、售卖土特产,帮助村民增加收入,就一定会受到乡村社会的欢迎”^①,但现实并非如此。以乡村运营官、文产特派员等为代表的外来主体虽能够意识到地方实践需以地方居民为主导,且他们扮演的角色仅是资源提供者,但多数地方实践仍难以获得地方居民的广泛响应。其根源在于地方居民多对进入地方的外来主体的身份合法性不予认可^②,进而对由外来主体推动的文旅融合实践的认同度较低,降低了其参与文旅融合实践的意愿。

外来主体本是外来文化的代表,而其又带着经济理性的理念进入地方,使其必然与注重人情色彩的本土居民产生冲突。在情感与利益、本土与外来双重矛盾的作用下,地方居民多以“不参与”来宣示自身对外来力量进入的态度,由此加剧了文旅融合行动者与地方居民之间的二元对立。而要调和这一矛盾,需要依托文化的调节作用,凝聚地方增长共识,打造“地方共同体”。共同体是被多数学者所讨论的一个概念,目前普遍将其定义为拥有共同价值观念的联合体,而共同价值观念的差异则会衍生出不同的共同体,包括利益共同体、情感共同体、乡村治理共同体等多种类型。地方共同体是超越利益共同体,同时又融合了情感共同体的一种联结形态,它既要求外来主体尊重地方本土文化、村规民约以及地方的行事逻辑,在经济理性基础上增加地方情感的考量;同时又能促使地方居民降低心理防线,以更包容的姿态接受、吸纳外来力量的利益资源,在人情色彩基础上发展利益主张。通过地方共同体的打造,地方将凝聚“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的、以促进地方高质量发展为共同价值目标的稳定行动网络。

美国文化人类学者露丝·本尼迪克曾指出:“一种文化,就象一个人,或多或少有一种思想与行为的一致模式。”^③这种“一致模式”即为被认同的文化。只有当个体对文化持接受、认同态度,才可将其内化为生命组成,并外化为行为方式,成为个体日常生活中的行动指南。当个体间遵循一套共通的生活方式,个体之间就形成了“共同体”。从这一角度理解地方共同体的打造,形成共同的价值理念是其关键。

据此,可以提出如下三条路径以促进未来文旅融合实践:一是构建多元主体的沟通平台,发挥地方政府在地方居民与外来主体之间的中介作用,协调外来主体与地方居民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二是充分考虑地方居民、外来主体的诉求,从利益需求、信仰诉求、情感依赖等多尺度构建一套双方皆可接受的行为模式,并强化各主体的文化认同。例如,可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框架出发,结合地方故事、先进典型等地方文化基因进行价值观的本土化再创,以增进地方文化自觉意识以及行动主体对文化价值理念的接受与认同程度。三是重视文化价值理念的宣传教育,以多元的、注重体验性与互动性的精神文化活动营造有利于文化价值理念传播的社会氛围,使文化价值理念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无时不有,潜移默化影响人的行为。借助地方共同体的打造,实现“共同文化”对个体行为的价值引领,驱动地方中的人的行为一致性,进而规范共同体中的人的经济行为。

(三)拓宽文旅融合的发展思路,释放文化对地方的赋能效应

正所谓“万物皆可‘文旅+’”。文旅融合从来都不应是外部导入的一种文化经济形态,而是地方内部生成的文化景观,这也符合当前旅游者求真、求异的体验诉求。从这一角度理解人文经济学视角

① 沙垚:《可沟通关系:化解乡村振兴多元主体关系的内在张力——基于A县的田野观察》,《新闻与传播研究》2023年第8期。

② 沙垚:《可沟通关系:化解乡村振兴多元主体关系的内在张力——基于A县的田野观察》,《新闻与传播研究》2023年第8期。

③ 露丝·本尼迪克:《文化模式》,何锡章、黄欢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36页。

下的文旅融合,其落脚点不应在文旅经济,而应在“地方文化+”经济。换言之,文旅融合不应是“为旅游而旅游”的结果,而是地方文化经济化过程中自然而然获得的旅游吸引力。

“地方文化+”经济揭示了地方文化作为一种资本所具有的经济价值,它是“以财富的形式具体表现出来的文化价值的积累”,并具有建筑、遗址、工艺品等有形形式以及思想、信念、传统等无形形式两种表现^①。但并非所有的地方文化资本皆具有产生经济价值的能力,其前提在于,文化资本中的文化价值得到消费者认可、认同并愿意为之买单^②。由此,理解文旅融合实践中如何发展“地方文化+”经济、激发文化赋能效应,其关键在于面向市场的地方文化的生产与再生产,即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方式利用地方文化资源,使其具有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乃至引领消费者的需求的能力,在此基础上形构其对地方以外消费者的旅游吸引力。但也需指出,发展“地方文化+”经济过程中,尤其要注重平衡地方文化保护传承与开发利用之间的关系,重视地方居民的文化阐释角度,避免文化本真性消解于文化经济化、资产化之中。

对未来文旅融合实践在发展“地方文化+”经济上的着力点,其至少应该包含三方面的指向。其一,做好地方文化资源的梳理与研判工作,包括但不限于地方产业、地方历史、地方名人等资源,根据资源的代表性及其在地方发展上的能效评估情况,进行资源分级。这一步是实现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转化的关键,即遴选有文化价值、经济价值的资源使其充当地方发展的文化资本,同时也是规避文旅融合实践中突出的同质化问题的有力手段。其二,在结合市场需求与地方阐释视角的前提下以多元化的文化创意介入地方文化资本的再开发工作,并以视觉化、系列化的文化符号、文化IP等文化资产开发形式来增强文化资本的赋能作用,由此拓宽可赋能的产业范围、提升赋能效应。其三,以创意化的文化资产赋能地方产业的提质升级,推动形成多元化的地方文化经济形态。此外,还需重视深度媒介化时代各类平台媒体的传播矩阵建设,以精准传播触及潜在受众,即未来旅游者。

四、结语

实践证明,对于文旅融合介入地方发展的不可持续困境,引介新理论并非长久之计。进一步挖掘“前景广阔”的文旅融合理论,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鉴于文旅融合存在根深蒂固的产业逻辑偏向,本研究在剖析文旅融合产业逻辑的形成脉络及其所带来的人文问题基础上,引入了极具指引意义的人文经济学视角,旨在依托经济活动向“人文”回归的思路为文旅融合的理论突破与实践进阶寻找方向。研究表明,人文经济学指引下的文旅融合需要重视“地方居民”在地方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并借助“地方文化”的调节作用与赋能功能,发展地方文化经济,推动地方社会高质量发展。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要“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业,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③。这一指示的提出,进一步凸显了本研究在实践层面上的重要意义,有必要通过理论创新与实践进阶路径探索,来指导未来文旅融合实践发展。同时,本文亦是人文经济学介入地方发展研究中的一次有益尝试,将为理论界与产业界正视人文经济学的指引力与文旅融合的解释力提供参考与借鉴。但也需指出,受限于经验材料,当前研究在实践路径的具体设计以及有效性、可行性论证方面仍力有未逮,这将是未来研究的重要着力方向。

① 戴维·思罗斯比、潘飞:《什么是文化资本?》,《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年第1期。

② 戴维·思罗斯比、潘飞:《什么是文化资本?》,《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年第1期。

③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5年,第27—28页。

Theoretical Breakthroughs and Practical Advancements in Culture-Tourism Integration: A Humanistic Economics Perspective

Zhang Zheng Zhang Huimin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P.R.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sustainability challenges arising from culture-tourism integration in local development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manifesting both as un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patterns and as “delocalization” crises resulting from inappropriate local tourism development. Early research primarily explored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from within culture-tourism integration practices. More recently, scholars have transcended the limitations of discussing culture-tourism in isolation, introducing foreign theories such as placemaking to provide new perspectives for China’s local revitalization practices. Unfortunately,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se strategies has remained limited. This raises the critical question: What should be the next step for local development?

This study argues that the academic preference for foreign theories over China’s indigenous culture-tourism integration framework reflects a lack of theoretical confidence. This assertion does not dismiss the value of theoretical borrowing but rather highlights how the substantial explanatory power of the “promising” culture-tourism integration framework has been undervalued. Meanwhile, we must recognize that as a theory emerging from industrial practice, culture-tourism integration inherently prioritizes industrial logic, potentially creating conflicts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local humanities. To address this, this study introduces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istic economics, which advocates for a retur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humanistic values.

Building upon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humanistic” essence in humanistic economics, this study innovatively proposes a culture-tourism integration theory from this perspective. Unlike traditional culture-tourism integration that prioritizes “tourists” and narrowly emphasizes the tourism value of local culture, this approach places “local residents” at the center and aims to fully leverage the mediating and enabling functions of “local culture.” This aligns closely with humanistic economics’ theoretical principles of “people-centered development” and “emphasizing culture’s value-guiding function.”

Guided by this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 the study explores advanced practical pathways by addressing three key questions: how to highlight the status of local residents, how to leverage local culture’s regulatory role, and how to realize local culture’s empowering function. The proposed pathways include: establishing a “people-centered” collaborative philosophy to strengthen local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and leadership; building goal-aligned local communities to harness culture’s role in regulating individual behavior; and broadening the development scope of culture-tourism integration to unleash culture’s empowering effects on localities.

Looking forward, academia and industry should fully recognize both the guiding power of humanistic economics and the explanatory strength of culture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in order to continually advance the theory and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is field.

Keywords: Culture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Humanistic economics; Local development; Local residents; Local culture

[责任编辑:郝云飞]